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马尾海战



看过电影《甲午海战》的人们，对于中日甲午海战的悲壮场面一定刻骨铭心。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188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前10年，中国海军和法国远东舰队在福建马尾还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海战”，历史上称为“马尾海战”或“马江海战”。关于这次海战，时人有这样一首评述的诗：

马江地扼闽江口，特简重臣资镇守。
运筹帷幄烛先几，岂容失著居人后？
敌船入，阵云集；战书来，星火急。
将士动色走相告，欲请诘朝已无及。
彼军突起环而攻，炮火轰击雷霆冲。
地崩山摧战士死，楼船划作飞灰红。
事机已坐失，束手更无策。
走向鼓山头，惊魂归不得。
吁嗟乎！
平时未习孙吴书，书生安能事兵符？
大言欺人实无补，随陆应羞不能武。

如此令人读后扼腕叹息的诗句，堪称马尾海战最为真实的写照！

一、国门初开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凯歌行进的时候，中国这一东方巨狮却仍在沉睡。清政府愚昧自负地试图仍旧保持封建王朝的至尊地位。清朝皇帝以“天朝大国”自居，藐视西洋各国为“化外愚蠢”、“蛮夷之邦”；封疆大吏毫无世界知识，与英人作了200年生意，却不知它在地球何方。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清人眼中被视为“奇技淫巧”、“旁门左道”。一步落后，便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挨打和被劫掠的结果，又是步步落后。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大炮、商品和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禁闭的大门，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权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发生了动摇，封闭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是以财富的巨大外流为代价的。西方列强用武力把中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之中，通过不平等贸易、战争赔款和“借贷”等手段从这个古老的国度中吮吸着人民的血汗。

但是，中华民族是不甘落后的，他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侵略势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去寻求真理，以图解救祖国。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奋起反抗，1851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

1856年，英国和法国为了扩大各自的侵略权益，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焚毁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的方式进一步出卖中国主权。这次战争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外统治者勾结起来，携手合作，共同绞杀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式下所采取的所谓“自救”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加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使

清朝统治者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封建官僚感到面临着前所未有过的“变局”。祖宗走惯的老路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局面，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他们看到西方殖民者拥有比中国旧式武器厉害得多的“坚炮利船”，外国军队训练有素，也远远胜于中国的绿营、八旗。于是，企望通过引进洋枪洋炮和西方先进技艺，求得“自强”，确保清朝统治。在奕訢、曾国藩等重臣的倡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清朝一部分掌握实权的官僚中，出现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开展了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初期以“自强”为中心，以获得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和操练新军为主要内容，在大量购买洋枪、洋炮的同时，洋务派还开始向外国购买机器设备。1864年，李鸿章致书总理衙门，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这一想法得到奕訢的赞赏，并上奏朝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他们的主张得到朝廷的认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军火工业。在10余年的时间内，先后建成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

洋务运动以“自强”、“图新”相标榜，其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手段，达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洋务派官僚不愿意也不敢提出把封建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要求。正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既不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又不可能摆脱国内封建势力的阻挠和侵蚀，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1884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开始打破了洋务派“师夷技以制夷”的幻梦。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了10年左右的所谓“合作政策”，就是用比较温和的手段联合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成为列强在华的侵略工具。但是，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其侵略性和扩张性大大加强，这种“合作”便不能不宣告破裂。列强在世界各地掀起争夺殖民地的狂潮，对中国边疆地区，使许多地处中国四邻唇齿相依的国家先后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面对这一系列友邻、边疆纷纷告急的局面，清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列强纷纷对中国进行蚕食和渗透，日本和美国侵略的重点是台湾，日本在1874年强占了琉球；英国企图从缅甸侵入云南边境，1876年，英国利用“马嘉理被杀”事件强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把通商口岸扩大到中国内地；俄国则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和边界勘定，割走中国西部大片领土。而法国则通过对越南的侵略和吞并，逐步把战火蔓延到中国本土。

二、欲壑难填

中法战争的爆发，起因于法国对于越南的蚕食和吞并。法国觊觎越南，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就来到越南，大搞间谍活动。18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势力被劲敌英国排挤之后，越南便成了法国向东方扩张的主要目标。它企图在印度支那建立强大的殖民据点，阻拦英国人进一步向远东的扩张去路，以便自己独占在远东的利益，并企图以越

南为基地，开辟一条通向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侵略道路。

中法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使越南南方 6 省沦为法国殖民地。随后，就从西贡出发，探测由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他们发现湄公河上游的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就把侵略目标转向越南北部，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云南的通道。1873 年 11 月，法国派遣安邨（y8）率领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地区，越南形势危急。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彼此间有着悠久的历史、经济和文化联系。越南统治者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越南国王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清王朝对越南负有保护之责。正是根据这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当越南遭到法国侵略时，其国王一方面邀请黑旗军协助抗法，一方同派遣使者向清朝政府告急，要求中国派兵前往。

黑旗军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活跃于广东、广西边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在作战中常常以七星黑旗为战旗，因而被称为黑旗军，其首领为刘永福。由于受到清军的围剿，1867 年，刘永福率领数百人进入越南北部，聚众耕牧，势力逐渐壮大，发展到 2000 余人，与越南人民休戚与共的黑旗军，对法国侵略者十分痛恨，他们接受了越南政府的邀请，由刘永福率领千余人，配合越南军民抗战。1873 年 12 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邨，法军被迫退出越南南部。

1874 年 3 月，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特权，法国侵略者力图借此消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对于这一条约，中国未予承认。

1880 年 9 月，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理出任法国总理，更变本加厉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开始增兵越南，并策划侵略中国。1882 年，法国政府指使海军司令李维业率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直窜云南。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援军助战，清政府鉴于形势的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军队以剿匪为名，进入越南驻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

1882 年 5 月，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同法军进行决战，击毙敌将李维业、副司令卢眉以下 30 余名军官、200 余名士兵，法军被迫退回河内。茹费理内阁利用李维业之死，竭力煽动全面侵越，除增援陆军外，又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 月间，法国一面在北越加紧进攻黑旗军，一面用军舰进攻越南中部，袭取越南国都顺化，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法国为了消除这一障碍，立即断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队，直接造成与中国对峙的形势。法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实现入侵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加深。

法国首先试图利用施加外交压力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他们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想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使中国撤出驻法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这个方案被清政府所拒绝，谈判毫无结果。

清王朝对于法国的咄咄进逼，基本上采取了妥协避让的态度。但是清政府在执行卖国政策时，也有一些顾虑和矛盾，首先，在“藩属”问题上，日

本已经在 1879 年占去了琉球，如果听任法国吞并越南，那么缅甸、朝鲜等国又怎么办？其次，在封闭政策问题上，当时沿海沿江已经允许列强通商，如果听任法国吞并越南，法国必然要进一步要求在云南、广西等内地诸省通商，然而清政府对内地基本上还想勉强维持闭关政策，不希望外国势力深入。最后，在黑旗军问题上，黑旗军已经在抗法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信心，如果支援它，这支军队曾经反抗过自己，还会因此与法国“失和”；如果不支援它，又怕产生一些不利于自己的后果。这些问题使得清政府在执行卖国政策的时候，采取了比较暧昧的态度和隐蔽的方式。

在法国吞并越南这一问题上，清朝统治者内部存在着矛盾，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政府最高决策者举旗不定，在军事上，一方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方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国出击。在外交上，一方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

清政府越是想委曲求全地逃避战争，越是避免不了战争。以茹费理为首的法国殖民者，早就抱定了侵略的野心。他们在天津谈判中如此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的，在顺化交涉中更确定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侵略野心便得到了更大的增长。

1883 年 10 月，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库帕被任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 月，法国议会通过 2900 万法郎军费和派遣 15000 名远征军的提案，决定夺取山西、北宁，迫使清政府让步。12 月中旬，法国侵略者悍然向驻扎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开始。

三、战和不定

中法战争的特点，是交战双方都是采取边打边谈的政策。从法国方面来说，这是由于普法战争失败后，国力下降，侵略实力不够，派不出大量军队到越南和中国，发动不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因而企图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从中国方面来说，则反映了清政府的腐败，暴露了它的内部矛盾。

从中法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清政府就一直在“打”与“和”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清政府中的实力派，是“无冕之王”慈禧太后和掌握外交实权和控制北洋海陆军的李鸿章，他们都是主张妥协的。李鸿章认为中国陆军勉强可以与法国作战，海军实力则相差悬殊，“不可与之争锋”，应尽量避免冲突。他们采取所谓“明交暗战”的策略，就是和法国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在暗中派没有番号的部队去支援黑旗军，并严格约束，“不先开衅”。

主张抵抗政策的清朝官员，都是国内不掌握实权的清流派，他们中还包括中国驻法国公使曾纪泽，他在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前，曾代表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对法国吞并越南提出抗议，力图挽回局面，维护越南的独立自主权力。他的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他的行动也没有得到慈禧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实力派支持。

中法战争开始后，法军的第一战略目标确定为山西。在这里的主要防军

是黑旗军，还有7个营的正规清军，法军倚仗优势装备迅速击退中国守军，进占山西。

1884年2月，法国任命库帕为法军统帅，兵力增加到16000人，图谋侵犯北宁，准备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这时驻扎北宁一带的清军约40个营，但由于将领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北宁、太原、兴化相继失守，中国军队全线溃退。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在当年6月与越南订立了最后的保护条约。

清政府在获悉前线军事遭遇挫败的消息后，撤换了大批地方将领，并全面改组了军机处，恭亲王奕訢被免职，实际大权转移到醇亲王奕譞的手中。清政府对于中央和地方所作的人事变动，仅仅是为了掩饰败迹，丝毫不意味着抵抗决心的加强。

为了制止清流派慷慨激昂的主战议论，慈禧利用这次大规模人事变更，把许多毫无作战经验的主战文人学士一一调到海防前线，使他们处于窘困境地，略示薄惩。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他们有的一筹莫展，有的仓皇失措，空言无补，贻误大局，清流派抗战舆论所起的作用，只是约束主持政局的李鸿章等人不敢过于明目张胆地妥协投降，而采取“阳抗阴降”的手段以缓和国内舆论的种种压力。

前线的军事失利，给了主和派以可乘之机，李鸿章等又开始加紧进行妥协乞和活动。为了迎合法国侵略者的意图，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任命淮系官僚李凤苞接替主战的湘系官员曾纪泽为驻法国公使，以便为议和铺平道路。

法国为了争取时间进行休整，一面扬言进攻广州，一面加紧向清王朝诱和。1884年5月11日，奕譞授权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对法越之间所有已定和未定条约概不过问，并将驻北圻的军队调回边界；法国不索取赔款，但商品可以从云南、广西输入中国内地。6月6日，法国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进一步确定了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

在中法简明条款订立后不久，法国侵略者就向驻扎在谅山还未接到撤防命令的清朝军队发动了进攻，声称一定要清军立即让出靠近广西边境的谅山等地。由于清军的反击，侵略军遭到一些伤亡，被迫后撤。法国政府借此向清政府提出了极无理的要求，要求中国为这次军事行动“赔偿”法国25000万法郎，约合白银3800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的一两个海口作为抵押。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清政府丝毫没有反抗侵略者的决心和准备，以为依靠幻想依靠列强的调停能够挽救危险的局面，用退兵让步办法，可以使侵略者“适可而止”。其实，退兵让步的结果，决满足不了侵略者得寸进尺的野心；而依靠列强的结果，只不过是纵容他们的干预而已。

奕譞上台前，对奕訢的对外政策曾进行过激烈的指责。这时，在法国的咄咄压力下，他也同样希望尽快把大事化小，态度不仅由强硬转向妥协，而且走得更远。他先请英、美等国出面调停，遭到法国拒绝后，又令两江总督曾国荃与法国驻上海公使巴德诺在上海谈判。谈判时断时续，不时陷入僵局。奕譞则完全寄希望于和谈，不顾法军的猖狂挑衅，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

“不可先发开衅”。

法国侵略者一面与清政府进行谈判，一面加紧推行炮舰政策。库帕等人狂妄地主张派舰队进攻南京、福州，或北上渤海湾，袭取旅顺、威海卫，直接威胁京师。茹费理认为，如果法国的手伸得太长，会引起其它资本主义列强的疑忌干涉，不如把攻击的目标暂定为福州、基隆两处。在侵略者的眼中，法国侵略者在诱和过程中，已经摸清了清政府的底细：清政府是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妥协的，因此，施加军事威胁和外交压力越大，攫取的权益就越多；清政府内部虽然有抵抗和投降两派，实际上，抵抗派不过是空喊，而把握实权的是投降派，他们才起主导作用。对于黑旗军，清政府基本不是主动支援，而企图采取借刀杀人，最终把它解散。就在这段时间里，法国海军大将库帕和利士比趁和谈的机会，秘密进行军事侦察，从多方面掌握了中国沿海各省的防务情报，窥探出闽、粤、江、浙的防务漏洞很多，重新确定了军事进攻的重点和方向。1884年7月中旬，库帕指挥法国远东舰队的主力舰只，浩浩荡荡地向福建闽江口驶来。

四、山雨欲来

马尾又称马江，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马尾港是一个河港，四周群山环抱，港阔水深，可停泊巨舰。从闽江口至马江，距离30余公里，沿岸地势险峻，炮台林立，仅马江附近即有7座炮台，并有部分克鲁伯大炮，防御能力很强。马尾港由于距海口较远，又多天然屏障，敌人的大型军舰想顺利驶入是相当困难的。

驻守马尾的福建水师，是清王朝除南洋、北洋水师之外的第三支海军。早在光绪年间，清政府鉴于日军依仗军舰侵扰台湾，即有加强海防之议，曾多次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楨筹办现代海军。开始是由南北洋大臣分别向国外订购和自造船只，自行节制，尚未形成舰队。后来由沈葆楨等建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从关税和商税中调拨400万两白银作为筹建海军的专款，计划在10年内建成北洋、南洋和粤洋三大舰队。由于经费有限，建设的重点始终放在北洋。1879年，清政府鉴于海军建设进展缓慢，又下令福建船政局把当时已有的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万一。中法战争前夕，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形成，分别有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曾国荃、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掌握。三支海军各有舰船10余艘，大多数购自外洋，质量较好的铁甲舰以北洋居多，南洋次之，福建最少。南北洋大臣地位均等，互不统辖，福建水师半属南洋，但不归南洋大臣直接指挥。这支海军成立较早，暮气最深，兵舰多用于迎送官员、拖船载勇，很少进行操练。

马尾港上游附近，是创建近20年的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是洋务派经营的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它始建于1866年是洋务派重臣左宗棠一手营建的，主要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

1866年6月，当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向清政府呈递了在福建开设造船厂的计划，他在奏折中说，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各国的兵舰可以直达天津，各海口的大小码头都停泊着外国船只，而中国的海船在日益减少，海防名存实亡，当务之急，应当赶快制造轮船，富国强兵。他认为，自己造船，比雇用或购买外国轮船困难，费用较高，而通过自己造船，可以培养一批掌握轮船驾驶和制造技术的人员，因而“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

左宗棠的建议，很快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于是，在福州闽江口上，办起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专造兵船的马尾船政局。这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造船厂设在马江口马尾山麓的中岐，上离省城 40 里，下离海口 60 里。厂内设有铸厂、模厂、船厂、轮机、锅炉、帆缆、储炮等大小 13 个分厂。工人在工作繁忙时达到 3700 人。船厂的创办费用去了白银 47 万两，日常所需的经费就达数万两，据统计，船厂所需的经费由开始的每年 60 余万两，增到了每年 80 余万两。这些经费都是从海关、土特产、药材、地丁等各种税款中分拨出来的。每年能拨出这样一笔巨款，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可见清政府的确是想有所作为。清政府的计划是在“五年告成”，形成个一有比较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规模的现代造船厂。

船厂的建造，从设计施工到机器安装制造，都依靠了法国。法国洋枪队管带日意格和德克碑两人为左宗棠一手经营、筹划，并分别担任正副监督，总揽一切船政事务。在技术上也是完全依靠外国的技术人员，雇佣了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据记载，最初雇佣的外国技术人员就多达 75 人。为了能培养出自己的技术人员，在船厂内设有英、法文学堂，用以培养驾驶、造船的技术人员。

马尾造船厂造出的第一艘轮船命名为“万年青”号。以后，陆续建造出了“湄云”、“福星”、“伏波”等，至马尾海战前，共计已经造出了 26 艘船只。

从表面上看，造出的船只数量不少，但实际上这些船的质量非常差，都是日意格用法国废弃的旧机器来拼凑的。其中有的船竟然连海上的风浪都经不起，到了海上，风浪一吹，就沉没了。因此，虽然数量上有 26 只之多，但能够投入使用的只有 10 余艘，其它的 10 余艘只能作海军的辅助舰。

驻守福州的地方大员，大多数是李鸿章的淮系将领和官僚。钦差大臣张佩纶，江苏人，出身翰林，官居学士，是李鸿章的乘龙快婿。他为人傲慢，目中无人。初到福建时，各级官吏纷纷奉迎，只要不是三品以上官员，他从不用正眼看。有人进谏当时马尾的武备松弛，他不但置若罔闻，反而责怪进谏者不明事理。上层统治集团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摇摆不定，使得前敌将领们对法国产生了很大幻想。张佩纶在朝时，也曾发表过激烈的主战言论，但在此时，也在盼望和谈成功，逐渐把昔日的豪言壮语收了回去。他见法舰频频向闽江口海面移动，却不作任何防守准备，在政令上对李鸿章唯命是从。

7 月 15 日，法国海军中将库帕率领一支拥有 8 艘军舰，共 4000 余吨的舰队抵达闽江口，以“游历”为名，向何如璋、张佩纶提出要进入马尾港停泊。何、张二人生怕法军再生事端，影响和谈，竟然同意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根据清政府“不可衅自我开”的指令，对于法国舰队的入侵非但不敢阻止，反而给以“殷勤友好的接待”。

法国舰队进入马尾后一反前言，日益监视港内的福建水师，不许中国舰只移动，并扬言谁敢移动就要开炮。

当法国兵舰进入马尾时，有人建议按照万国公法的规定，进入港口的兵舰不能超过两艘，停泊时间不能超过两星期，否则即行开战。福州将军穆善图要求执行这项规定，但张佩纶、何如璋都是李鸿章一派的官僚，生怕影响和议，因而放任法国兵舰自由出入港口。

福建水师在港内有 10 多艘小舰，总排水量只有 6500 吨，零乱地在江边抛锚。中国官兵愤恨难平，他们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多次要求起

锚整训，以进行自卫。但是，张佩纶、何如璋惟恐妨碍“和谈”，一再以“战期未至”为借口，“不准无命自行起锚”，甚至严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在这种危险的局面下，各船管驾向指挥官张成建议将兵舰散开，首尾相接数里，以便相互救应，这样纵使有一艘兵舰失利，其它舰只还可以继续作战；否则，如果法舰首先开炮，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张成对这一意见根本不加考虑，各舰仍然散乱地停泊在江心。只要法军一开炮，连起锚都来不及，更不用说灵活调动了。

法国兵舰突然闯入马尾，在福建引起了极大震动。福州地处偏狭，多年罕见兵革，突闻法舰排布马江，人心浮动。富有之家，纷纷逃往偏远之乡。街巷之中，议论纷纷。

福州 8 营卫兵，本为守城而设，因久无战事，军械已经腐锈不堪。直到法舰入港后，才慌忙召集全城的铁匠、铜匠和裁缝，在保福局日夜赶制枪枝、子弹、旗帜、号衣及各种军器。

法舰入港在上层统治者中也引起很大反响。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法国的军器是新发明的枪炮，他们的舰队又拥有先进铁甲战舰；而中国的战舰及枪炮都很陈旧，与敌交战，难以胜取。值得庆幸的是，长门南北岸及中岐等处的炮台十分坚固，防御力量较强，如果水陆协调行动，或许可以侥幸于万一。而一些腐朽之士则盲目乐观，传言“夷人”的目光只能直视，不能旋转，交战时只要我们用侧炮攻击，必稳操胜算，又准备了小船数十艘，满载硫磺、火罐和土火箭，准备以诸葛亮借东风之计，火烧敌舰。

船政大臣何如璋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仍然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并且下令对清军各舰严加约束，战期未至，不准发给弹药，没有命令，不准自行起锚。一时间，福州内外议论纷纷，甚至怀疑“船政大人”有通敌之嫌。

巡抚张朝栋惟恐福州遭到围困，官署绝粮，下令手下抢购柴草、大米、咸鱼等储存起来。填饱了自己的口腹，却不顾百姓的生灵涂炭。

更为可笑的是总督何璟，在法军来犯之际，没有任何退敌良策，却整日龟缩在官署中，拜佛念经，乞求佛祖保佑。一日仰观天象，发现西北角有“妖云”四起，乃是兵灾之“凶兆”，于是每天早晨便派遣军卒数人持枪前往屏山顶上，向半空中胡乱劈刺，以“击散妖云”。

法国舰队的强盗行径，引起了马尾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呈递“万民书”纷纷要求先发制敌，建议潜水破坏敌舰，坚决表示：“要是官家害怕，不敢抵抗，那抗法的事，我们愿意承担下来。”但是，人民请缨杀敌的正义要求，却遭到张佩纶等人的阻挠，直至后来局势非常紧张之时，部分民众才被允许参战。

法国舰队进驻马尾共有各种战舰 12 艘，其中巡洋舰 7 艘，炮舰 3 艘，水雷舰 2 艘，拥有各种火炮 70 余门。其具体部署是：以 3 艘巡洋舰布置在罗星塔以东的洋面，企图击毁中国船舰、炮台和造船厂。同时，又在金牌附近的洋面布置了 2 艘军舰，以阻止清朝的舰队堵住出口，以便在袭击后顺利地驶出马尾。又在马祖澳附近的洋面上布置了部分军舰，作为机动的部队，以随时策应袭击马尾的舰队。

就这样，法国远东舰队与中国福建海军在马尾港开始了长达 1 个多月的相持与对峙。进入港内的法国舰队，大体保持了 8 艘的建制，它们每日出出进进，测量航道，添加煤炭，轮流周转。不久，又分派出两支兵舰停泊在闽

安、馆头、长门等处，防止清军封锁航道。

法舰与清军同泊1月，不见中方有任何备战形迹，侵略气焰更为嚣张，库帕通过法国内阁向议会报告，狂妄地宣称：“中国万不敢战，我军4000人即可扫平中国七省！”

五、“不宣而战”

清政府的软弱妥协，进一步助长了法国的嚣张气焰。1884年8月4日清晨，法国海军少将利比士率领3艘兵舰进犯基隆，企图夺取基隆的煤矿，保证法国舰队的燃料供应。他们向基隆守军投递劝降书，遭到严正拒绝。次日清晨，法舰轰击基隆炮台。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英勇反击。双方相持一小时后，法军轰毁基隆炮台，强行登陆，由于遭到守军的截击，被迫退回舰上。

8月10日，清政府就法国在谈判期间突袭台湾提出强烈抗议，并呼吁各国“秉公评论”。可是，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反而借口“基隆事件”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继续要求对“北黎事件”进行赔款。

8月16日，法国议会决定扩大对华战争，通过了3800万法郎的侵华军费，叫嚣要进行“本世纪最大一次征伐”，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使用各种必要的方法”使中国屈服，并拟定了新的勒索条件。19日，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以基隆事件为借口，无理要求赔款8000万法郎，分10年付清。21日，谢满禄又故意在清政府答复之前下旗离开北京。与此同时，中国驻法国公使李凤苞也离开法国，前往柏林，中法外交关系完全破裂。

8月17日，清政府眼见和谈无望，不得不撤回上海谈判代表，下令沿海沿江各省严加戒备。但对马江方面，仅指示：“对于已经在港内的法国兵舰，应该设法阻止其出港；对于没有进港的，不允许他们再进入。”但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仍然没有被解除。

当时，马尾一带水陆布防的兵力已有所加强：海军舰只11艘，江防陆军逐渐增加到20余营，还有大量自动参加战备的民众武装。清军的部署是：以11个营的兵力扼守马江和船厂一带江岸；11营守长门、瑄（gu3n）头等炮台，又以民壮近2000人协守炮台；11艘舰只与法舰相持于马江江面，另以旧式战船及渔船各20艘分泊于罗星塔两侧。张佩纶、何如璋负责指挥马江一带水陆各军，穆图善驻长门，何璟、张兆栋驻福州。由于清政府和战不定，前线将领昏庸无能，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加上装备不良，弹药不足，因此，总的兵力虽然较法方优势，而战斗力却很弱。

基隆一战失败之后，法国政府就准备立即破坏马尾军港，击毁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舰队，破坏造船厂。并打算在退出马尾之后，集中全部的力量，夺取基隆、淡水，控制台湾北部。如果计划一旦得手，再率队北上进攻旅顺、威海卫，以达到迫使清政府满足其无理的要求。

8月22日，也就是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下旗离京的次日，法国政府给库帕发来了电报：立即消灭马尾港内的中国福建海军。

库帕接到电令，立即着手准备发起攻击。当时停泊在马江的法国舰队有军舰8艘，依次为窝尔达号、野猫号、腹蛇号、杜居士路因号、费勒斯号、德斯丹号、南台号和哈乞开斯号，共计14500余吨，另有鱼雷艇2艘，还有2艘军舰梭尼号和雷诺堡号驻扎在金牌、瑄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

保障后路安全。参战法舰共有重炮 77 门，还有不少射速为每秒 60 发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兵员约 1800 人。

经过 1 个多月的窥探和侦察，法国舰队对于福建水师的兵舰数量、武器装备、将领配置、士兵多少、舰船的吨位、航速、型号、甚至每艘舰只的下水年限，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对马尾港内的航道宽窄、水流缓急以及潮水涨落的时间，也积累了大量资料。根据他们的情报，当时停泊在马尾水域内的中国舰只有 10 余艘，它们分别是：

第一号，扬武舰，管驾张诚，广东人。

第二号，振威舰，管驾许寿山。福州人。

第三号，福胜舰，管驾叶琛，福州人。

第四号，建胜舰，管驾不详。

第五号，飞云舰，管驾高胜云，广东人。

第六号，福星舰，管驾陈英，福州人。

第七号，济安舰，管驾不详。

第八号，义升舰，管驾林则友，福州人。

第九号，福波舰，管驾吕文英，广东人。

此外，还有两艘运兵船，一名海镜，一名汀杭。

库帕决定次日下午趁涨潮时分发起攻击。这一作战计划对于法国十分有利，当时的舰船是从船头下锚停泊的，船身随着潮水的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库帕选择在落潮时开战，可使大部分中国军舰位于法国兵舰的前方，从而暴露在法国舰队的主要炮火之下，无法进行有利的回击。

库帕召集所有的法国舰长到窝尔达号上来，宣布了他的作战计划：在 8 月 22 日下午 2 时左右，当退潮时移动船身的时候，各船即准备出动，各船保持现在停泊的距离。当旗舰升起第一号旗时，两只水雷艇应立即出动，攻击停泊在法国旗舰上游的两艘中国战船。当第一号旗帜收回时，所有战舰发起全线进攻，窝尔达号应以其左舷大炮和机枪支援两只水雷艇的攻击，与此同时，要用右舷主炮向中国旗舰发起攻击。这时，野猫号、益士弼号和腹蛇号应迅速从右舷离开旗舰，驶向造船厂附近，向停泊在那里的 3 只中国炮舰和 3 只通讯舰进攻。杜居士路因号、费勒斯号和德斯丹号应各以一侧炮火击沉与它们相对应的中方舰只，另一侧攻打成列的中国师船；德斯丹号随即开入临近的还关水流汇合处，追逐敌方水雷艇。

就在法国舰队积极备战的同时，张佩纶、何如璋等人还在做着议和的美梦。法军初到马尾之时，他们心中也确实紧张了一阵子，唯恐战事一开，性命不保，但时间一久，见两国舰队长期对峙，相安无事，心中便也“踏实”下来，似乎这种局面更证明了和局只在早晚之间的说法，因而斗志全无。偶然有人问起时局进展，便答“和局之成已定”。连日来，水军将领意气难平，他们联名上书，请张大人亲驾军舰，指挥全军。张佩纶含糊其辞，托故不答。

8 月 23 日上午 8 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把最后通牒递交到了马江船政署，限福建水师于当天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即行开战。何如璋接到战书，惊恐万状，张佩纶、何璟等人也慌作一团，他们昨天刚刚收到李鸿章的电报，告知议和又有眉目，因而对眼前发生的事实，真有些不敢相信。几个人商议了半晌，全无良策，竟然颤颤惊惊地回复法国使臣：“我国军队尚未作好准备，不能开战，能不能把决战的日期改到明日？”为了推卸责任，张佩纶、

何如璋等人竟对福建海军官兵严密封锁了法军即将开战的消息，迟迟不下达准备战斗的命令。

整整一个宝贵的上午，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侵略者在磨刀霍霍，而中国官兵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仍茫然不觉。9时30分，开始涨潮，潮水持续上涨了将近4小时之久，法国官兵们严格警戒，小心翼翼地监视着中国舰队的行动。库帕焦躁不安地在窝尔达号甲板上来回踱步，他深深明白，这次进入地方军港、利用退潮时分发起攻击的决定是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如果清军敢于在这个时候发起攻击，那么不仅他的全盘作战计划要落空，整个战略形势还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对面清军没有任何动静，接近中午了，库帕长舒了一口气，下令舰队升火待发，准备战斗。

直到中午，张佩纶、何如璋看到法国军舰已经升火待发，才命船政工程长魏瀚前往法舰回递战书，请法国改变交战的日期。侵略者发动突然袭击的蓄谋已定，根本不会因何、张等人的乞求而更改。主宾礼毕，库帕即傲慢地宣称：“请贵国使者速速离开我舰，我军马上就要开炮了！”魏瀚一听此语，仓惶无措，连忙赶回向何如璋禀报。

下午1点左右，潮水已经涨平，天色忽然阴沉下来，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直到这时，福建海军才刚刚接到作战命令，各舰纷纷领取弹药，升火起锚。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不等中国舰队完全起锚，法舰的第一排炮弹就已经铺天盖地落了下来。

六、马尾喋血

1884年8月23日下午1时56分，马尾海战终于打响了。趁海上涨潮的有利时机，法舰突然发起攻击，一发发炮弹呼啸着落向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舰只。福建水师还没来得及起锚，就有多艘舰只中弹，一时间，港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琛航”号和“永保”号当即被击沉，多艘战舰受到重创。自法国舰队进入马尾的那一天开始，福建水师的官兵们就憋足了一口气，要与侵略者决一死战，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仗开的是如此的窝囊。

炮声一响，往常不可一世的钦差大臣张佩纶便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不省人事，幸亏左右急速扶起，将他背走。来到猴屿乡，惊魂稍定，发现脚下的官靴少了一只，“张大人”的一肚子怨气便发泄到了当差头上，喝令左右以军棍从事。当差的抱头叫屈：“匆忙之中，只能顾及大人的性命，那里还顾得上大人的官靴，纵然有罪，也不是小人的过错，而是法国人造孽呀！”与此同时，何如璋、陆营统领王超群，也逃的逃、散的散，丢盔弃甲，清军指挥一片混乱。

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水师下层官兵英勇还击。“扬武”号是水师的旗舰，也是福建水师唯一的一艘轻型巡洋舰，舰上官兵，用尾炮还击在它下游的“窝尔达”号，发炮弹就准确地命中了舰桥，击毙引水员和5名水手，舰上的库帕侥幸脱险。

开战之始，飞云号管驾高胜云亲自指挥炮手发炮，向敌舰猛击，多次命中敌舰。飞云号以一支小舰独力抵挡敌军3艘大舰，一直顽强坚持，不肯退缩，并始终把炮口指向库帕所在的旗舰窝尔达号，直到中弹沉没。

福星号管驾陈英在战舰起锚后，即当众大呼：“我们的舰和炮都很小，应当冲上去，与敌人近战！”左右有人请求：“伏波、艺新号已经开向上游，

我舰也应当开向上游，合 3 舰之力进行攻击。”陈英怒道：“你要让我逃跑吗？”随即对众人大喊：“男子汉当以死报国，事已到此，有进无退！”法军见福星号勇往直前，又以 3 艘兵舰对其进行围攻。陈英指挥福星号在弹雨中灵活地掉转炮口从敌阵中横贯而出，驶向下游，在下游加满弹药后，又一次冲入敌阵，与敌舰酣战，直到最后在了望台上中炮殉国。三副王涟继续指挥开炮，不久，又中弹倒地，后继者仍然力战不却。全船配额 95 人，激战到最后仅剩不足 20 人，鲜血染红了甲板。

在罗星塔下游，炮舰“振威”号被刚从闽江口外赶来的一艘法国巡洋舰“凯旋”号击穿，首尾均已起火，船身失去控制，随着江流漂向下游。但舰上的官兵仍然英勇奋战，直到最后被鱼雷击中沉没前的一刹那，还发射了最后一颗炮弹，把敌军一名舰长和两名船员打成重伤。

海战开始后，在马尾港内还停泊有一些其它列强的舰船。以中立国自诩的美国兵舰，在战斗中起到了掩护法国兵舰的作用。法国第 45 号水雷艇在激烈的战斗中被打伤，它来到美国远达普来号巡洋舰的跟前，一会儿躲到舰的这一侧，一会儿又躲到舰的那一边，并不断地寻找机会向中国舰只发射冷炮。闽江口外的两艘法国兵船还插上了美国国旗，企图混进马尾港内助战。

在茫茫的大雨中，浓烟遮蔽了整个战场，混乱之中，敌友难辨。

江面战斗只持续了半个小时，炮声渐渐地缓和下来，在滚滚的浓烟中，中国兵舰在不断地爆炸、沉没，江面上满是木块、桅杆和帆船的碎片，上面爬满了落水的中国官兵。他们的头浮出水面，痛苦挣扎着。法舰上的侵略者兽性大发，用机枪不停对他们进行着扫射，不断有人中弹、沉没，血水染红了江面。远处，清军的火攻船起火爆炸，两艘装载士兵的帆船渐渐沉没。

一队法军乘小艇冲上了伤痕累累的福星号，在舰上插上了法国国旗，几支法国小艇拖着它们的“战利品”，向罗星塔下游缓缓驶去。饱受屈辱的福星舰上烈焰熊熊，甲板上、舰桥上、烟囱旁，到处躺满了中国官兵的尸体。法军无法控制舰上的火势，只得放弃了他们的“猎获物”，抓走了几个垂死的中国士兵作为“战俘”。几分钟后，福星号便缓缓沉入了江中。

对于损失惨重的马尾海战，时人许奎（lu2n）在乐府诗《马尾江》中这样写道：

无诸野老吞哭声，冬日愁过马江曲。
一军猿鹤与沙虫，水族蛟龙俱荼毒。
无人薄我失机宜，张侯安足持世局？
同时应策尽书生，大敌猝惊空瑟缩。
兵家易言古所忌，韬略不娴奚约束！
五材并用创既奇，以火胜金惨尤酷。
彭名大节自觥觥，失律丧师愆难赎。
几等管钥盗发局，非仅过书言举烛。
曹沫纵有复仇心，三败不死名已辱。
天心悔祸事难知，旧将还应推颇牧。
涛声厉鬼作忠魂，一湾江水生春绿。

可见，对于这次海战的失利，时人早已有了公允的评述。

3 时左右，马尾水面上已经没有中国战船了，只有几处燃烧的船底和漂浮的桅杆。在这次海战中，清朝海军扬武、济安、飞云、伏波、福星、振威、艺新、永保、琛航、福胜和建胜等 11 艘兵舰，以及商船 19 艘全部被炸沉。

中国海军将士伤亡共计 722 人，其中死亡 521 人，伤者 150 人，失踪 51 人。法国舰队仅死伤 30 余人，有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

当天晚上，库帕在他发送给法国政府的公文中得意洋洋地宣称：“今天是一个好的开端。”按照法军所上报的夸大的“战果”：马尾一役，“中国方面损失了 22 艘战舰或帆船，死亡 5 个战舰司令、39 个将官，2000 名士兵或水手，至于我们的损失，为 6 人毙命，27 人受伤，战舰连一处严重的损伤也没有。”

七、榕城惨劫

海上的战斗结束后陆上的争夺并没有停止。中国官兵并没有被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所吓到，海上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中国陆军将士便怀着满腔的义愤，开始利用陆上的炮台向法舰顽强反击。

下午 4 时，库帕为了节省弹药，向各舰发出信号，停止攻击性炮击，而只进行防御性发炮。陆上清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紧了对敌舰的攻击。罗星塔炮台距离敌舰只有 400 米，炮台多处被击中起火，但仍然断断续续地向敌舰发出榴弹炮。高踞造船厂的 3 门克鲁伯大炮，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威力极大。其中火力最强的一门一刻不停地瞄准窝尔达号轰击，复仇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法军旗舰的四周。疲惫已极的库帕不得不重新下令，对炮台发起进攻。战斗又持续了 1 个多小时，3 门大炮终于完全沉寂下来，而窝尔达号所付出的代价是数人被击毙，多人受伤，其中 1 人是库帕的副官赖威尔。

下午 5 时左右，库帕下令舰队停止炮击，所有舰只围成一个堡垒形的火力圈，向外抛锚，准备过夜。这时，由北龙尼指挥的武装战队准备出发，他的任务是追逐和破坏中国的水雷小艇，使其无法恢复使用。

夜晚来临了，法国人吃惊地发现，从陆地又飘来了一串串的火焰，这是中国将士制造的火攻船。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被装满了点燃的硫磺、火药和柴草，向敌舰飘来。这些火攻船大多数未接近法舰便被敌人的榴弹炮击中沉没，偶有靠近者，因为法舰多为铁甲包裹，也很难引燃。但是，中国将士这种英勇不屈的精神，却使法国侵略者感到深深的恐惧，黑夜中那点点浮动的火焰蔚为壮观，像是那些战死的中国将士不屈的冤魂。火攻船搅得法国舰队整夜不得安宁，他们不得不不停地变换着停泊的位置，以躲避这些巨大的火盆。

天终于亮了，按照法军的预定计划，将派出水雷艇和登陆战队，去抢占和破坏福州造船厂。也许是经过一夜火攻船的袭扰，库帕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他可使用登陆的水兵只不过 600 人，而中国方面则有数千步兵，另据传闻他们已在船厂埋设了地雷。而经过马江一战，中国军人的顽强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草率登陆，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库帕改变计划，改由兵舰轰击福州造船厂。

8 月 24 日上午，法军部分炮舰乘涨潮时沿闽江逆流行驶到福建造船厂附近，用重达 28 公斤的榴弹炮轰击船厂。与此同时，法舰继续对马江附近的帆船、舢板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不仅船厂本身，连同它在过去 10 多年间所制造出来的船只，全部被侵略者的炮火毁坏，即使如此，法军还认为，由于吃水量的限制，拥有大口径炮的杜居士路因号和凯旋号不能驶到上游参加攻击，因而进攻“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破坏程度”。这

座由法国人一手筹划、设计所建立起来的造船厂，最终又被法国兵舰的炮火摧毁。

24日深夜，顽强不屈的福建海军残部又驾着两艘鱼雷小艇，试图乘黑夜偷袭停泊在最前面的法舰兵舰腹蛇号，在敌人发觉后，又试图改变航向攻击杜居士路因号，最终被敌舰击中，先后沉没。

按照法国舰队原先的战略意图，是在击沉港内中国舰只后，乘潮水上涨，将炮舰开进鼓山边狮头鼻，用格林炮轰击福州。由于当时暴雨倾盆，狂风大作，影响了舰队行进的速度。等到风平浪静时，海潮已退去，法军不得不改变计划。法舰在马尾不敢久留，惟恐弹药、燃料耗尽，陆上伏兵杀出，因而决定撤出马尾。

8月25日，法国海军陆战队的一部在罗星塔登陆，夺取了3门克鲁伯大炮。当日退潮时分，法国舰队随着潮水退离马尾，法舰起锚时，先高奏凯歌，然后开炮示威，舰队驶离马尾。库帕高居指挥塔上，用望远镜搜索沿江两岸，指挥舰队对沿岸炮台进行轰击。

在以后的几天里，法舰开始驶向下游，对闽江两岸的炮台挨个发起攻击。这里的炮台都是用来对付来自港外的敌人，不能掉转炮口回击从后方攻击的敌舰，因而全部被毁。长门炮台最为险要，清将穆图善率领兵卒驻守，远远望见敌舰来攻，事先埋伏好兵卒，诱敌上岸。法军见炮台无人把守，派遣士兵登陆进行破坏，四下伏兵一起杀出，斩敌数名，余者狼狈逃回舰上。

海战结束后的几天里，中国官兵对法国侵略者进行了顽强不屈的袭扰，但由于水师的全军覆没，使整个马尾失去了赖以防御的战略屏障，福州内外、马江两岸，全部被侵略者蹂躏，成为一片焦土和废墟。

马尾海战失利后，钦差张佩纶、船政何璟两大臣生怕官位难保，日夜寝食不安。当他们听说长门炮台毙敌的消息后，喜出望外，连夜起草奏本，飞送京城，邀功请赏。

大清气运未曾倾，闽省缘何出佞臣？

船政有心私法国，制台素性爱夷人。

贪心巡抚图自己，拾命将军感鬼神。

可笑钦差无用辈，空悬圣诏误朝廷！

马尾海战清军惨败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福州。福建水师中的官兵多是福建人，听到战败的消息，福州内外一片啼夫哭子之声。从马江中打捞起来的尸体，大多身首异处，很难找到一个全尸。阵亡官兵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江岸上到处都是亲属的啼哭和哀号之声。人们从嗣洋屿打捞起了500多具尸体，其中132人四肢全无。原来在开战之时，各兵舰中弹起火，官兵纷纷逃离，泅水求生。法军惨无人道，用驱逐舰向浮在江面上的清军横冲直撞，并用机枪扫射，用竹竿猛击，直到他们完全沉没。悲愤已极的人们，怀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把无主尸首归葬到一处，并建立了一座阵亡祠。

八、镇海退敌

法国远东舰队偷袭马江，清政府感到有损“天朝”体面和尊严，在主战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对法宣战。1884年8月26日，也就是马尾海战结束后的第三天，清政府被迫下诏对法国宣战。所谓“宣战”的上谕，本质上不过是对内推卸马尾海战失败的责任，对外向列强诉苦。

马尾海战后，清政府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撤销了张佩纶、何如璋、张兆栋，何璟等人在福建的任职，改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防务，以福州将军穆图善和漕运总督杨昌浚为帮办大臣，闽中防务逐渐恢复。

马尾偷袭得手之后，库帕认为“虽然中国此次完全失败”，但“福州距离北京太远，不足以使（清）帝国朝廷获得教训”，坚决主张把战火烧到中国北方。茹费理则担心一旦北上扩大战争，可能招致其它列强的干涉，而与北洋舰队交锋，又会影响李鸿章的地位，而他正是法国政府“应该尽量宽待”的未来谈判的极好对手。于是，夺取台湾北部，又成为法国侵略军的战略目标。

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守军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登陆后，失去了兵舰的炮火支援，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

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进展不大。法国舰队又在库帕的率领下北上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增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的两艘。

镇海位于甬江海口，北岸为沙滩，敌舰不能靠岸，易于防守，南岸港叉较多，易于登陆。马尾海战在清朝守将中引起很大震动，镇江提督欧阳利从中吸取了教训，以南岸为重点，严密部署了防御。他充实兵力，调整部署，分兵镇守镇海至宁波沿江各隘，在江心钉桩沉船，堵塞航道，防止敌舰冲入港内。鉴于马尾海战中沿岸炮台多被敌舰炮火摧毁的教训，守军在金鸡山等险要处修筑暗炮台，安设进口大炮，台上覆土一丈，护以毛竹、草皮，又在一些高起显露之处修筑假炮台10余座，只插旗帜，不设一兵，以迷惑敌人。同时，在沿岸各险要处加修围墙、长堤，挖掘壕沟、密布地雷、障碍物等，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防御体系。为了不让敌军掌握港内的确切情报，清军在各乡组织民团，清查奸细，把法国教堂的传教士全部迁往后方，派兵监视，以切断敌军的内应。他们还高价收买外国引水人员，不让他们为法军所利用。

1885年2月底，库帕率4艘法国兵舰侵入镇海海面。马尾海战，法国舰队以极其轻微的代价全歼了中国福建海军，从此，库帕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根本没有把一个小小的镇海放在眼里。欧阳利见强敌骄横，沉着应战，下令沉船封堵河口，命令各营严阵以待。停泊在港内的超远、元凯2舰和3艘援台兵舰也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3月1日，一艘法舰企图进港侦察，被北岸招宝山炮台守军开炮击退，接着，4艘法舰合力来犯，守军岸炮和舰炮一齐轰击，击穿敌先头舰一艘。法舰不支，施放烟幕逃走。当天夜间，库帕又命两艘小船从乾口靠岸，企图登陆偷袭，被中国守军击退。次日，受伤的法国舰只被迫驶离镇海，其余3艘停泊原处。入夜，法国又出动2艘鱼雷艇进行偷袭，又被守军水路炮火击退。

3日上午，库帕恼羞成怒，亲自率领舰队发起强攻，同样遭到守军的猛烈炮击，其中一艘烟筒中炮受损，其余各舰掉头逃跑。此后，法军又数次利用夜间进行偷渡或发动鱼雷攻击，均遭到失败。库帕智穷力竭，不得不在3月7日率舰队南返。

镇海之战，法舰遭到扼守镇海的中国军队的英勇还击。由于守军作了充分的准备，水陆防御严密，自身伤亡很少。而法国舰队则有两艘巡洋舰负伤，

两只舢舨沉没，死伤不少官兵。库帕的座舰也被击中，他本人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这个马尾海战中屠杀中国士兵的元凶，终于受到了他应得的惩罚。

镇海保卫战的胜利，扼制了法国舰队的进攻势头，打破了李鸿章之流所鼓吹的“法国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刷洗了中国军队在马尾所蒙受的耻辱，鼓舞国内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志和勇气。

九、“不败而败”

与海上激战的同时，中法之间在陆上的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李鸿章的部下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法军乘势侵占镇南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谅山一带，伺机再犯。

在这危急时刻，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了退休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到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防御。冯子材得悉法军准备重新进犯镇南关，便指挥将士在隘口抢筑了一条高7尺、长3里，底宽1丈的长墙，横跨东西两岭，筑成了较为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4日，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形势危急。70岁高龄的冯子材身先士卒，冲出墙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于将法军击退。中国官兵乘势反击，一向蔑视清军的法国军队，被打得大败。越南人民和清军关外游勇主动配合作战，经过3天激烈战斗，3月29日，清军收复谅山，并向南推进，准备收复河内、北宁。

在镇南关大战胜利的同一天，黑旗军和越南起义部队在临洮大败法军，接着收复了广威府、黄岗屯、鹤江和老社等地。中国军队在临洮的胜利，使法国侵略者不仅在进攻广西的战争中，同时也在向云南方向的进攻中，遭到了失败。两路失败的结果，使法军不仅没有反攻的可能，而且连企图退守红河三角洲的打算也感到十分困难。

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引起法国统治者的巨大震动和惊慌。3月30日，愤怒的法国人民成千上万地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包围了议会，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茹费理内阁于当天晚上被迫倒台。

镇南关胜利，收复谅山和开始反攻的消息传到国内以后，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信心。但是，这次胜利却没有促使清政府改变卖国投降的政策。如果清政府从前对黑旗军的胜利心存疑忌的话，那么这时却已腐败到连自己军队的胜利也不敢相信了。

中国官兵在前方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却成了清政府用以进行乞和活动的资本。事实上，这种投降活动自开战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李鸿章一贯主张只要多少保全“面子”就该妥协求和，在他看来，战争如果进行下去，“大局将不可收拾”。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列强也都极力促成以中国方面妥协让步条件的和议，他们既不愿法国独占侵华权益，更不愿看见中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当然会激起中国民族的自立精神，那对侵略中国的列强都是十分不利的。

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清政府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被迫宣战以后，也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民变”、“兵变”，一直力图尽快结束战事。正当抗法斗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清政府为了向战败的法国求和，竟然下令全线停战。

法国在谅山大败以后，不得不稍稍降低议和的条件，这对清政府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时机。于是，在 1885 年 4 月 7 日，慈禧太后发布停战令。4 月 17 日，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得诺在天津正式签订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并给予法国在广西、云南通商的特殊权益，规定中国以后如果要在这两省修筑铁路，要同法国“商办”。清政府既承认了法国对于越南的吞并，又使法国侵略者打开中国西南边境大门的目的如愿以偿。由于侵略者在战场上失利，没有提出“赔款”的要求，并答应从基隆和澎湖撤兵，使得清王朝感到在“面子”上已经很过得去了。

停战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大哗，一些爱国人士把清政府的停战令比作南宋秦桧命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痛加谴责。

1886 年到 1888 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境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使法国得到了更多的侵略权益。中国的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使其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就这样，法国侵略者利用了清政府的软弱和妥协，在谈判桌上得到了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这种局面下，中法战争的结果只能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十、勿忘国耻

中法战争是法国资产阶级实行掠夺殖民地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次战争中，法国侵略者采用一打一拉的或边打边拉的策略，来达到吞并越南、镇压黑旗军的目的；并企图由此打开通往云南、广西的道路，勒索中国巨额赔款，进一步实现“征服中华帝国”的迷梦。

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贯穿在中法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和每一个外交谈判中。它替法国的侵略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和玩弄侵略手段的有利条件，法国侵略者每当受到中国军民的沉重打击时，就通过投降派特别是李鸿章来施加外交压力，企图通过清王朝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当外交协议达成以后，法国侵略者为了掠夺更多的利益，就制造借口重新挑起战争。根据他们过去的侵略经验来看，清朝统治者在武力压迫之下是更容易屈服的。法国侵略者就是这样对清政府采取军事和外交同时并进和双管齐下的侵略方式，来掠夺更多的利益。

马尾海战中，中国福建海军全军覆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在开战的那一天，法国共有兵舰 8 艘，其中 2 艘为装甲舰，总吨位 14514 吨，另有 2 艘水雷艇，将士 1790 人，77 座可以发射巨型炮弹的大炮，此外，还有许多新式机关枪。清军方面，有 11 艘兵舰，其中 9 艘是木制的，总吨位 6500 吨，将士 1040 人，装有 45 座战炮，只有个别炮位口径较大，此外，还有 13 只旧式的中国炮船和一些武装的划船。不论在数量和质量上，清朝海军都处于劣势。马尾海战的惨败，确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由于清王朝妥协求和的一贯政策所造成的。很明显，法国利用谈判麻痹清政府，使他们在军事上丧失警惕，致使马尾守军仓促应战，措手不及，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就地理环境而言，清朝军队占有绝对优势。马尾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清军只要有充分的作战准备，就可以凭借天险将敌人拒之国门之外。这样一

个险要的军港，却听凭侵略者的舰队出入无阻，沿岸所筑的炮台形同虚设。于是，清朝政府就把敌人请到家门口来进行厮杀了。

清政府腐败和内部的派系斗争对马江战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当时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能联合起来，发挥近海作战的长处，利用敌人远道而来，补给困难的弱点，合力围攻，完全有取胜的可能。可是，淮系、湘系军阀都把自己掌握的舰队当做巩固个人权势的资本，彼此勾心斗角。福建海军受到优势敌人的威胁时，一再请求支援，李鸿章出于自身的地方利益，拒绝派遣北洋海军和南洋海军去进行支援。他夸张法国兵舰是如何厉害，火炮如何锋利，说什么“北洋水师的舰只都很小，不足和法国的大兵舰相抗衡”，“如果抽调北洋水师，旅顺必定不能自保”，拒绝北洋水师去马尾增援。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控制下的南洋海军也拒不支援，造成福建舰队孤军苦战，全军覆没。

前线将领的昏庸无能，也是招至马尾战败的重要原因。张佩纶等人明知敌人有“密据要害先发制人”的图谋，却借口“不敢事先张皇”，不作认真的应敌准备，甚至将舰上的炮弹也控制起来。张佩纶、何如璋都不懂军事，只知道奉承李鸿章的昏庸官僚。在他们的指挥下，即使中国军队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纵观海战全局，法国侵略者有利因素虽很多，不利因素也不少，特别是它发动的战争性质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加上战线很长，兵力不足，远隔重洋，补给困难等，使法军并不具备必胜的条件。法国的战略决策主要建立在清军不敢打、不能打的基础上，是一种军事冒险配合政治讹诈的政策。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法军也犯有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错误，如果清军在海上集中舰队，陆上集中兵力，采取坚决抗击的方针，法军消灭福建水师的企图就不会那么轻易得逞。至于库帕将大量舰只驶入闽江口，长期同中国舰队首尾相连地停泊在一处，完全是一种极端冒险的军事赌注，犯了兵家之大忌。如果清军稍有胆识，敢于趁涨潮的有利时机先发制敌，那么全军覆没的很可能不是福建海军，而是库帕的远东舰队。

中法战争结束后，各资本主义列强看到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和卖国投降，竟然在法国战事失利的情况下，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不久，列强纷纷援引此例，割取缅甸、朝鲜。从此以后，列强一步步进逼，相继占领了中国周围许多原来由清王朝保护的国家，并将侵略势力逐渐伸入中国西藏和四川、云南各省，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一步一步地加深。

在马尾海战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福州造船厂毁于一旦。中法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开始走向破产，一些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提出了改良主义的思想，为后来的“戊戌变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中法战争中，中国军民所取得的胜利，转眼之间就被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所葬送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使广大人民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先进的中国人日益感到亡国灭种的威胁，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马尾海战使人们开始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落后挨打，不仅仅是由于侵略者的船坚炮利，还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仅仅靠引进西洋的先进技术，买进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不能够彻底拯救中国的。要“自立”、“图强”，只有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社会制度。

马尾海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广大中国军民在这次作战中表现了高度的

爱国热忱。他们誓死抵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上层统治者畏缩投降的可耻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马尾海战结束许多年以后，在福州一带还流传着这样的诗句：“至今马江头，黄口知国耻。”就是说在马尾海战后，连年幼的孩童都懂得了“国耻”的含义。一个主权国家的军港，竟然听任交战国的炮舰自由出入达1月之久，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奇闻。马尾海战中中国福建海军的全军覆没，不仅是福建人民的耻辱，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应该牢记这个血的教训。

勿忘国耻，图强自立，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的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